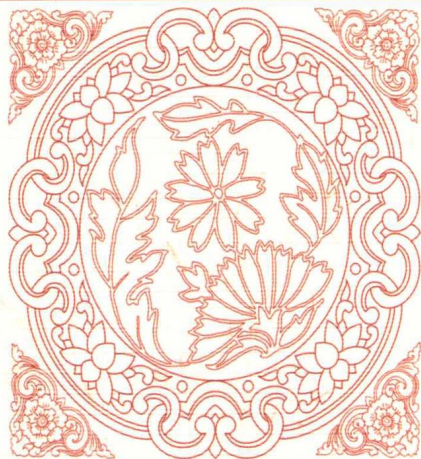


思想文化建设综论

黄 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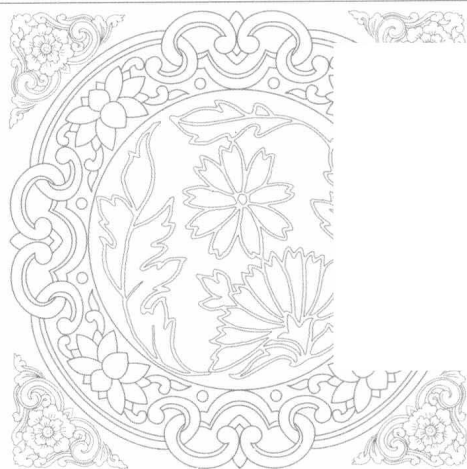


Sixiang Wenhua Jianshe Zonglu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思想文化建设综论

黄 钊 著



Sixiang Wenhua Jianshe Zonglu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文化建设综论 / 黄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203 - 2686 - 5

I. ①思… II. ①黄…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05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徐沐熙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3
字 数 465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黄 钊

探索思想文化建设之道

——《思想文化建设综论》之序

骆郁廷*

黄钊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园地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和丰硕学术成果的知名专家学者。在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一度青黄不接的关键时期，黄钊教授带头进行学术转换，承担起精研学术、培养后学的重任，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黄钊教授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前沿问题，致力于梳理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思想遗产，并把两者有机结合，相互贯通，古为今用，形成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儒家德育学说论纲》《中国道德文化》等有影响的专著，不仅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域，还促进了我国古代优秀德育成果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思想文化建设综论》是黄钊教授的又一力作，该书由作者将多年已发表的关于思想教育与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凝练融汇而成，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核心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和辛勤耕耘的结晶。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九章内容。上篇《文化建理论》，着重探讨了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建设、中国特色哲理文化系列进行了较为透彻的论述；中篇《思想教育论》，对思想教育所涉及的理论与方法从自身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下篇

* 骆郁廷，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序书评选辑》，主要是黄钊教授近些年为一些思想文化类新著撰写的书序、书评，这不仅体现了黄钊教授时刻关注思想文化领域的学术新动向，还表明了他关心和支持学者朋友探究思想文化这一学术“金矿”的鲜明态度。纵览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探索性。围绕思想文化建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者以交叉学科为支点，尝试对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历史考察和深入分析，提出很多独到的理论见解。比如在论证道德建设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地位时，作者立足于道德精神对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关系和深刻影响，从凝聚力、亲和力、规约力“三力”进行论证，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论证深刻。该书对公民道德教育、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我党三十余年来观念变革的探索，都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二是交叉性。走过而立之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以实践为基础，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相关成果，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在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作者立足于思想政治学科发展的基础，把研究触角延伸到古今中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德育思想中丰富有益的思想遗产，旨在“以古人之资源，开学科之生面”，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德育、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对接，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途径，在传承的过程中对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容进行凝练、融合、创新和发展，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三是深刻性。该书不仅回应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诸如研究对象、发展规律、学科建设等一系列核心的基础理论问题，还对深刻挖掘中国传统优秀德育成果的丰富内容和现实价值，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加强中外德育的比较，实施德治和法治结合的治国方略，进行了深入探索，既有中国古代优秀德育成果的历史回溯和理论挖掘，又有对当前思想文化领域热点问题的现实关照和逻辑建构，不乏独到见解。

当然，书中提出用“思想教育学”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是

否妥当，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然而，瑕不掩瑜，本书是一本值得读者认真一读并仔细品味的学术陈酿。

“精神经百炼，锋锐坚不挫”。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国古代德育思想领域颇有研究和建树的学者，黄钊教授虽已七十八岁高龄仍坚持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上下求索，笔耕不辍，为学科发展尽心竭力，令人由衷钦佩。《思想文化建设综论》这一力作的出版，将有助于更多学者进一步关注、思考和探讨思想文化建设问题，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建设的融合、创新与发展。在此，我衷心祝愿黄老生命之树长青，学术之路常新！

2017年6月8日于武汉大学

前 言

这部拙著，题名为《思想文化建设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是笔者围绕思想文化建设所作的理论探索的一个特辑。三十余年来，由于专业建设的需要，我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道德建设”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并为之奋力拼搏，上下求索，不敢懈怠。功夫不负苦心人，终能围绕这一方向，先后在国内相关的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两百余篇，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之珍贵遗产及其现代价值；二是探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所涉及的一些现实理论问题。关于前者，敝人已选辑相关的系列论文纳入拙著《国学与儒道释文化发微》^①一书；关于后者，亦选辑了数十篇论文归入本书。因此，这两本书的出版，算是把自己数十年来的论文成果，作了一个选择性的集结。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有必要先在这里谈谈自己从事思想文化建设研究的思想动机（或曰缘起）及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

多年来，我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建设的研究，主要是由于自己所从事的思想教育专业的特别需要。由于专业建设和教学实践的推动，促使我自觉认真学习中央文件，不断加深对从事这一工作的深远战略意义的认识，以至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因而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不断开拓，奋力探求。

^① 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正式出版。

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从本质上说,就是构筑与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主体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或曰创造先进文化。这是一项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它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文明进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公民精神家园的建立与完善,因而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就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明确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到了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号召要在“把物质文明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到了2011年10月,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提出“文化是民族的主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求“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到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2016年5月,党的总书记

^① 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党的十八大文件汇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

习近平同志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坚定文化自信”的理念，他说：“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并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突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重大使命。

以上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有关重要讲话，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当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道路，从而给予了当代理论工作者无比重要的精神支撑。这一切，也就成为了笔者致力于思想文化建设研究的思想动力。这些年来，如果说我在思想文化领域所作的工作还有某种值得肯定的东西的话，那也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引导和关爱，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思想文化建设实践的启迪与陶冶。自己作为一名思想文化理论工作者，作为从事思想教育专业的教师，只是对党的指示精神逐步有所领会，并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而已，算是问心无愧吧。

二

《综论》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九章。上篇为《文化建设论》，中篇为《思想教育论》，下篇为《书序书评选辑》，这里拟分别对其基本内容作出简要阐述。

先说《文化建设论》。该篇是由一系列有关文化建设的单篇论文辑集而成，全篇包括四章：一为《文化建设之功能与价值概说》；二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探析》；三为《当代政治文化评述》；四为《中国特色哲理文化发微》。其中，第一章着重探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价值、功能以及地位等问题，旨在强调：加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第二章集中阐明在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全面加强道德建设、重塑社会主义新道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加强公民道德建

设的方向、道路和具体内容、方法等问题；第三章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着重探讨了党和国家所推行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所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旨在体悟、领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创造，以便为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服务；第四章从中国特色的哲理文化视角，探讨了古今部分思想家对构建中国特色哲理文化的卓越贡献，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来总结、梳理中国的哲学成果，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总之，这四章内容，从总体上构成了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内容的思想体系，表达了笔者关于当代文化建设所涉及的有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肤浅见解。

次说《思想教育论》。该篇是由一系列有关思想教育的单篇论文辑集而成，全篇包括两章：一为《思想教育理论研析》（即第五章）；二为《思想教育方法浅探》（即第六章）。前者着重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问题、思想转化规律问题、学科如何建设与深化问题、思想教育信息与思想教育决策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学科理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后者着重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涉及的方式、方法、手段、原则等问题，其中涉及如何处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发挥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如何发挥教育者的身教示范功能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借鉴历史与服务现实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思想教育中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对于以上两个系列的问题，本书都从特定视角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从而分别从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构成了以思想教育为中心内容的学术体系。

再看《书序书评选辑》。近些年来，我有幸为一些思想文化类的新著写过书序与书评，这里汇集的就是其中的主要成果。全篇包括三章：一是《为相关文化建设类新著献序》（即第七章），其中收录了我为刘周堂著《前期儒家文化研究》、赵国球著《奇妙的思维》以及库流正著《老子正解》等八部有关文化建设类著作所作的《序》；二是《为相关思想教育类新著献序》（即第八章），其中收录了我为沈壮海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余双好著《现代德育课程论》、熊建生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论》等十部有关思想教育类著作所撰的《序》；三是《关于思想文化类若干新著评说》（即第九章），

收录了我为罗炽著《中国哲学简史》、郑永廷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柳菊新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八部著作所撰的书评文章。书序是书的楔子或前言，它从特定层面诠释了书的基本精神，寄予了序者对作者的理解与期待；书评则从特定视角揭示了书的长短优劣，反映了书评作者对该书作价值评估的基本维度。我之所以将自己多年来有关书评与书序的文字辑集于此，主要是由于它们均从特定视角反映了本人读书的心得体会，且同本书的基本宗旨相一致。关于这些，我在后面相关的正文中还会作进一步的说明。

三

本书虽是由一系列单篇论文结集而成，但由于作者在体系上的适当安排，已在整体布局方面构成了以思想文化建设为中心内容的著作，因此也有其独到之处，并显示出了某些鲜明特色，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注重阐发先进文化的重大价值。如前文所述，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一再强调先进文化价值的地位与作用，将之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无比重要，因而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指导方针。为了体现这一基本精神，本书在文化价值的阐发方面下了较大功夫。

例如，第一章中的《关于文化之重大价值的若干思考》一文，集中对文化价值作了系统阐发，强调指出：“文化是资源，它可以激励我们将精神变为物质”；“文化是良药，它可以医治精神颓废病和道德缺失症”；“文化是法宝，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改革，开拓新局”；“文化是灵魂，它可以辅佐我们端正航向，阔步走向未来。”虽然，这些说法未必精当，但作为一家之言，它基本上阐明了文化价值的独特优势，对于启迪人们建立“精神家园”，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特定的启迪意义，将之视为对文化价值的客观描述，似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发人深思。

又如，在第二章《社会主义道德文化探析》中，安排有《论道德建设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一文，集中阐明了社会主义

道德的重大价值，指出：“道德是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杠杆，是社会文明的核心内容。道德力量，不仅是国家发展、时代进步、民风纯正、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撑，也是公民个体立身做人、明荣知耻、拒斥腐败、持守气节的力量源泉。道德精神可以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贬抑假、恶、丑，以净化社会风气，陶冶人们情操，塑造高尚品格，因而在文化软实力中，作用尤其突出。有的学者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概括为‘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文化规约力’，这较为贴近科学的真实。用这个标尺来衡量道德文化的力量，可以说这‘三力’在道德文化中不仅完全具备，而且十分典型。”该文从“三力”的角度，深刻论证了道德理念的重大文化价值，从而实事求是地揭示了道德所具有的“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特征。除上述诸例之外，本书第三章中的第六篇文章《论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成就》、第七篇文章《论儒家优秀政治理念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现实价值》以及第九章中的一系列书评文章，也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文化价值的种种表现形式。这些都说明本书十分重视对文化价值的系统阐发。

二是自觉弘扬当代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无比光辉灿烂的时代，它经历着“改革开放”圣火的熏陶与洗礼，推行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进行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切从本质上说，就是努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无疑是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不仅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世界其他民族也从未经历过。正是这一伟大时代，赋予了当代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曾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号召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时代的召唤。为了张扬当今的时代精神，本书也作了相应的努力。

例如，在第一章中，专门安排了《关于倡导“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意义》一文。该文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伟大号召为指针，将“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五大精神，认为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伟大时代的呼唤。我们所处的时代，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满怀豪情地深化改革、开创未来、描绘与推行‘中国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有鉴于此，“全党全民学习与弘扬焦裕禄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迫切需要”。不难看出，这里所描述的“焦裕禄精神”，就集中体现了当今的时代精神。

又如，在第一章中，还专门收录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呼唤红色文化精神的复归》一文。该文指出：“‘红色文化’是中国现代史上革命文化的别称。它从特定角度反映了我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展示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群众英勇无畏、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红色文化曾起着号召群众、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的精神支撑作用。”“今天，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党和我国人民在当年所创造的红色文化，是否还有它的现实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从特定角度，多方面地呼唤红色文化的复归，特别是红色文化所倡导的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忠党爱国精神、追求革命理想与信念的精神，等等，都在特定条件下向人们招手，……”“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我们的社会现实中正在滋生一系列积极向上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气象，其中就包括对红色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最为典型的，是全国出现了学习雷锋精神的新热潮，并涌现出许许多多雷锋式的模范人物。……”毫无疑问，红色文化精神的复归，也从特定视角展现了当今的时代精神。除上述论文外，本书第二章中的《要高度重视新时期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论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的深远意义》等拙文，也均从特定视角，张扬了当代中国以改革开放、积极向上、无私奉献为特色的时代精神。

三是认真总结新时期的思想教育理论与方法成果。思想教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在总体上已基本构建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两大支柱，均属于该学科的主体工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本书的又一特色，是注重总结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新时期的思想教育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新成果。

例如，第五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应在深化理论研究上狠下功夫》一文，重点探讨了“深化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及“应从哪些方面深化理论研究”两大问题。关于前者，笔者从三个方面作了回答，即：第一，深化理论研究，是加强学科基础建设的需要；第二，深化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史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第三，从本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来看，深化理论研究已迫在眉睫。关于后者，该文也从三个方面作了说明，即：第一，要注重完善和深化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要重视对学科发展史的经验总结；第三，要用理论回答当代实践的呼唤。这些论述，比较客观地论证了深化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学界深化本学科研究，似亦有相应的参考价值。

又如，第六章中的《论邓小平对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卓越贡献》一文，较为客观地将邓小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造性论述归纳为八点，即：1. 注重“实事求是”的方法；2. 强调“解放思想”的方法；3. 重视“整体关照”的方法；4. 提倡“以身作则”的方法；5. 实施“理想激励”的方法；6. 推崇“价值判断”的方法；7. 倡导“两手抓”的方法；8. 提出“警右防‘左’”的方法。这八大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当代思想教育方法的多样性、灵活性、针对性、实用性以及相互联系性等重要属性。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理论上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为解决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问题指明了方向，既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造性思考，又表明了这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具有的高瞻远瞩的独特政治智慧，是当代中国建构思想教育方法的重要成果，值得高度重视。除上述论文外，本书第八章中《一部深研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力作》《一部精研现代德育课程及德育新模式的好书》《一部全方位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佳作》以及第九章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新成果》等相关拙文，

也都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的相关内容。

四是深入体悟党和政府所推行的大政方针的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各条战线生机勃勃、龙腾虎跃，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新进步，成就十分显著。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党的大政方针的合理性，或曰科学性。党的大政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的智慧创造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认真研究与体悟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科学性，从本质上说，就是宣传、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也是当代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本书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

例如，第三章中的《牢记“四个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文，以胡锦涛同志于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依据，集中探讨了坚持“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该讲话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个讲话，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归纳为“四个坚定不移”，并指出：“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至关重要。”这一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党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又一篇纲领性文献，成为了党和政府所推行的大政方针。为此，该文集中对之作具体探讨，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胡锦涛同志在《六·二五讲话》中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非常及时，无比正确。它们既各有其特定的内容，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且都服务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四个坚定不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占据着极端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在今后的现实生活中，要坚决按“四个坚定不移”想问题、办事情，更加自觉地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无愧于新时代的贡献。毫无疑问，这些论述是在自觉宣传与体悟党的大政

方针。

又如，第三章中的《论我党三十年来在观念大变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深远意义》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观念变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文章围绕七大新观念（即：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 “三个有利于”；3.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4. “三个代表”；5.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6. “科学发展”；7. “构建和谐社会”）展开论述，具体地说，就是对这七大观念确立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表现形态及其深远意义，分别作了较为客观和系统的剖析。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新观念的确立，从特定视角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伟步伐，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我国上层建筑在适应经济基础变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三十年的伟大变革实践中得到的巨大发展，反映了我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所确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它们从不同侧面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并自觉践行。虽然，用七大观念变革来概括我党在改革开放中在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还只是个人管见，未必完善、准确，但据实而论，这七大观念也基本反映了三十年来党和政府设计的当代中国大政方针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亦从特定角度表达了笔者对党的的大政方针的深入体悟。除上述文章外，围绕学习党的的大政方针的心得体会，书中还收录了《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创造性贡献》《坚持反腐倡廉，自觉捍卫党的纯洁性》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发挥先进文化功能上狠下功夫》等相关论文，均从特定层面阐明了笔者对党的的大政方针所具科学性的肤浅认识。虽然文章的内容难免粗糙，但它们均从特定角度表达了作者对党的的大政方针的体悟，则是毫未虚夸的。

最后，除以上四项特征外，本书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方面，就是注重古今贯通，突出古为今用。例如，书中收入的《孔子塑造“君子”人格的理论创造及其现实价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根基》《当代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中华传统美德中吸取营养》《当代德育学科的发展应当重视借鉴传统德育遗产》以及《论社会主义核心价